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 敝帚集

冯其庸论红楼梦

冯其庸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敝帚集

冯其庸论红楼梦

冯其庸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 / 冯其庸著.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3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0030-9

I. ①敝… II. ①冯…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7731 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

著 者 | 冯其庸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周海燕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9

字 数 | 45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030-9

定 价 | 7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文章

副主编 王能宪 田黎明 吕品田 贾磊磊

|     |     |     |           |     |
|-----|-----|-----|-----------|-----|
| 委 员 | 丁亚平 | 方 宁 | 方李莉       | 牛根富 |
|     | 王列生 | 刘 托 | 刘梦溪       | 朱乐耕 |
|     | 孙玉明 | 吴文科 | 吴为山       | 李 一 |
|     | 李树峰 | 李胜洪 | 李心峰       | 宋宝珍 |
|     | 欧建平 | 杨飞云 | 杨 治       | 杨 斌 |
|     | 罗 微 | 骆芃芃 | 祝东力       | 项 阳 |
|     | 资华筠 | 莫 言 | 秦华生       | 高显莉 |
|     | 贾志刚 | 管 峻 | (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田海明

副主任 朱智润 韩 进

|     |     |           |     |     |
|-----|-----|-----------|-----|-----|
| 委 员 | 王训海 | 左克诚       | 余 玲 | 杨红卫 |
|     | 杨迎会 | 李 强       | 张国平 | 周海燕 |
|     | 赵秀彦 | 唐元明       | 唐 伽 | 贾兴权 |
|     | 徐敏峰 | (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 自 叙

我是1975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的，院长是袁水拍。水拍是我的老友，那时他还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我去研究院，是为了组织班子校注《红楼梦》，这件事也是我与他商定后报国务院批准的。

我在研究院，从1975年起直到1996年离休，前后共二十年。之前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从1954年到1975年，也是二十年。但我在研究院的二十年却与前二十年大不相同，可以说我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在研究院完成的。

我在研究院的主要学术研究，就是对《红楼梦》的校注和研究。当然《红楼梦》的校注有不少人参加，如李希凡、吕启祥、胡文彬等都是校注组的。

《红楼梦》是大海，是深渊；也是高山，不是我们几个人几年时间所能穷尽的。我们不过是尽力完成了此书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校订注释任务而已。

要正确地了解《红楼梦》，首先是要了解作者曹雪芹及其百年家世。因为曹雪芹的百年家世兴衰，甚至最后的含冤败落，在他的书里是不能实写的，但雪芹也有意地略有一言半语的透露，以引人深思。《红楼梦》是曹雪芹饱含着血泪写的，但这一切却都只能隐含在欢乐的笑声里面。如不了解他的家世生平，尤其是他祖父曹寅、父亲曹頔的时代和遭遇，是不会深切地理解这一点的。

我收在这本书里的第一部分，就是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专题论文。我另有专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为篇幅所限，当然不能收入本书，读者如有兴趣，可资查考。

要深入正确了解《红楼梦》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红楼梦》的抄本。《红楼梦》的抄本很多，但曹雪芹生前的抄本，却只有三种，即“甲戌本”（乾隆十九年）、“己卯本”（乾隆二十四年）、“庚辰本”（乾隆二十五年）。

这三种本子，还要细论。

“甲戌本”虽然是乾隆十九年本，但现存刘铨福藏本实际已是“甲戌”原本的传抄本，其抄定年代已在乾隆末年或更晚，这个本子是商人的重抄本，因此，周绍良先生称它是“蒸锅铺本”。因为在“庚辰本”上成段的脂批，在“甲戌本”上却被分成几段分抄在几处，其批语与正文还不能对应，而且错别字甚多，这说明抄手的水平不高。再有，此本版口有脂砚斋的专用名词，说明这是“甲戌本”的专用稿纸，这与曹雪芹当时贫穷落魄的现实毫不相符，足证这是书贾抄卖的本子。但此本所据底本却是一个极重要的本子，它的首回比别本多出四百余字，上下情节完全连贯，为别本所无，殊为可贵。

乾隆二十四年的“己卯本”，为怡亲王府的原抄，其底本来源应直接来自曹家，因怡亲王允祥是奉旨监管曹家的，与曹家关系甚密（详情见予《论庚辰本》）。且此本有“祥”字“晓”字的避讳，足证其确是怡府原抄。以怡亲王允祥、弘晓与曹家的特殊关系，故此本当确是据曹家原本所抄无疑。可惜此本散失近半，且无朱批，成为残璧。

意想不到的的是乾隆二十五年的“庚辰本”，其墨书部分却全是据“己卯本”复抄的，“己卯本”上的过录特征，都被照样过录在“庚辰本”上，连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上“祥”字的避讳写法“禳”，也被照录在“庚辰本”上（详见《论庚辰本》）。这样原残缺一半的“己卯本”，却可从“庚辰本”的墨抄部分看到全璧。现存“庚辰本”上许多朱笔脂批，是后来续批的，且大都有署名和纪年，可资辨识，这也是别本所无，极为珍贵。

这样说来，曹雪芹去世前的三种抄本，只有“庚辰本”是最完整的。

所以，研究《红楼梦》，必需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原抄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除“庚辰本”外，其余后来的抄本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林黛玉的眉毛，国内所有抄本，无一是正确的，却偏偏只有俄藏本是正确的，这已为红

学研究者所公认。所以我们重视曹雪芹生前留下的抄本，却不能忽视后来的许多抄本。

因此，《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要点，是抄本的研究。我在本书里，选了几篇有关抄本研究的重要论文。我另有抄本研究的专著《漱石集》，读者可以参考。

《红楼梦》研究的第三个要点，是关于《红楼梦》思想的研究，我在本书里也选了几篇重要论文。《红楼梦》的思想性质涉及对《红楼梦》的评价。有人把它说成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就大大地贬低了此书的价值。《红楼梦》的思想是属于初期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民主思想，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因为它还未成熟，所以它还混含着当时的一些封建意识，这正是初期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民主思想未成熟的时代特征。而且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只把这种思想单独赋予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人，其他人毫不沾边，这说明曹雪芹对这种新的思想性质已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也有明确的把握界限，否则不会把这种新思想单独赋予这两个新型的人物。对这个问题，我的《论红楼梦思想》一书做了详论，读者也可以互参。

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我还有《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解梦集》（上、下），《八家评批红楼梦》，《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上、下），等等，也可供参阅。

几十年来，《红楼梦》的研究也在发展中，我的这些文章，只能算是那个时期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留痕而已！

2014年4月5日清明节  
宽堂九十又二于瓜饭楼

## 我与《红楼梦》(代序)

我最初接触《红楼梦》是1943年我读无锡工专高中一年级时，那时有位范老师说《红楼梦》尽是讲作诗的，你喜欢作诗，去读《红楼梦》吧。但我读后却不感兴趣，因为《红楼梦》不是讲作诗的。

1946年，我考入无锡国专，那时著名的老师很多，如王遽常、朱东润、冯振心、吴白匋、周贻白等。1948年我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由王遽常先生授诸子学，讲《庄子》，由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由顾佛影先生讲诗学，由王佩琚先生讲地理学，由刘诗荪先生讲《红楼梦》。这是我在课堂上正式听讲《红楼梦》的唯一的一学期。但那时听课很自由，想不听就不听，而我正着迷于词学，整天在顾廷龙先生的合众图书馆里撰写《蒋鹿潭年谱》和《水云楼诗词辑校》，所以刘先生的课听了开头几堂就没有再听，但研究《红楼梦》是一门学问这一认识，这时算是确立了。

我真正读《红楼梦》是1954年到北京以后。我刚来北京就碰上批判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运动。自己略无所知，只是认真地跟着学习，结合各人的文章，反复读《红楼梦》；也对别人的文章做比较研究，实际上这是我认真读《红楼梦》的开始，但却没有做研究。

1966年“文革”开始，我首先受冲击，也遭到了“抄家”，这在当时司空见惯，虽然很气愤，但毕竟不是我一人的遭遇。令我气愤而又吃惊的是把我的《红楼梦》抄走，而且当黄色书籍展览。这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明明在文学

史课上都讲了《红楼梦》，怎么一下就把它作为黄色小说示众了呢？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毁了，所以不管我当时正在受批斗，每天夜深人静以后，我就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因为每天只能深夜抄写，所以整整抄了一年。这一年的抄写，是我真正深入《红楼梦》的过程，联系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特别是许多朋友和熟人挨整后愤而自杀，我每每抄书到动情之处，不禁掩卷痛哭；到抄完这部书，我自觉从思想上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相通了许多。我最后抄完了重读此诗时，忽觉这四句话实在就是一部《红楼梦》的最好的概括，此诗既是开头，更是全书的总结！从此以后，我大概算进入读《红楼梦》的真境界了。

1973年到1974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评“红”热潮，我由北京市委调去参加评《红楼梦》的写作组，当时一起调去约有六七个人。确定了全书的章节后，就由大家分头撰写，我写的是全书的“序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二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的斗争”这三章，后来这三章收入我的《梦边集》。现在回头看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些东西，自觉可以覆瓿。一是当时还是“文革”后期，评“红”都是以毛泽东主席对《红楼梦》的一些批示作为依据的，市委组织这个写作班子，其目的也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根据来评论《红楼梦》，所以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研究《红楼梦》，只能停留在表面理解上；二是我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还有待于深入。不久前有人竟把我们当时写的这本书当作政治罪状来指责，使我不禁为之哑然失笑，他不知道这种故伎早已过时了！

当时，我写完了这三章后就提前离开写作组，到社科院历史所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编写组去工作了。

我去社科院历史所参加范老《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要感谢黎澍同志和李新同志，他们为了调我去历史所，不知花了多少力气，有一段时间，黎澍同志一早起来就坐在电话机旁边向有关部门催调，而李新同志则不时给我电话，告诉我期在必去。虽然我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终未调成，然而这两位前辈的殷殷爱护之情，我是终生难忘的。

1974年,袁水拍同志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有一次,他特地跑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我的住处找我,说要考虑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文化事业,并提到古籍整理的问题,我就建议校订《红楼梦》。他经过认真思考,觉得可以,就要我先起草一个报告,等李希凡同志从西安回来一起讨论。我很快就起草好了给他送去,后来这个报告由国务院批准了。由水拍同志担任校订组组长,由李希凡同志和我担任副组长,同时向各地借调了一批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于1975年正式开始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正式进行了一年左右,到1976年初,不少借调来的同志都回了原单位,最后只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继续做校注工作。1976年也是社会和政局最动荡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到4月5日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群众运动;7月6日朱德总司令去世;7月28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凌晨,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四人帮”彻底垮台。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情况下,我们的校注工作也只好时断时续。不久,贺敬之同志出任文化部部长,他再次肯定并指示校注《红楼梦》的工作不能停,因此这项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1982年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一、我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

从1975年到1982年整整七年,我一直在从事《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校注工作中遇到很多具体问题,例如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问题,《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等,结合当时的工作我依次研究了这些问题,并写成书出版。我最早研究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的问题。

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从何下手,颇费斟酌。恰好我的朋友外语学院的鲁宝元同志来看我,提到了有一部《五庆堂曹氏宗谱》,上面有曹雪芹上祖的世系。我说这部书曹家早已献出去并且已经在“文革”中丢失了,我在1963年故宫文华殿举行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物展览时,曾经隔着玻璃柜看过,现在要研究它,已经没有原始资料了。鲁宝元同志说,他知道在曹仪策先生手里还有一本底本,也是老本子,他可以帮我去向曹仪策先生

商量，借出来进行研究。过不了几天，他就来陪我去看曹仪策先生，曹先生一口答应将此谱借给我，他说过几天给我送去。果然没有几天他就将《五庆堂曹氏宗谱》送来了，在我手里留了一个月，我为他写了跋文，并录了副本，拍了照片，以备研究，将原本归还了他。

我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的研究，是从查实谱上人物入手的，结果却查出来一系列重要的文献资料，大大充实了我的研究。现将这些文献资料和我的研究结果概述如下：

### （一）《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明崇祯七年，1634）条

墨尔根戴清贝勒多尔袞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是清代官方文献资料中有关曹雪芹上世的最早的一条史料。这条史料的价值：一是，它说明了曹振彦此时已归到多尔袞属下，这是他后来发迹的一大契机。根据《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天聪四年四月的时候，曹振彦在额驸佟养性部下当“教官”，佟养性的部队是“乌真超哈”（汉语为重兵），是督造红衣大炮的。佟养性所率的都是“汉军”，是“汉军”总理，故曹振彦当时也该是“汉军”；但到天聪八年，他已到多尔袞属下，入了正白旗。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佟养性于天聪六年去世的缘故。但应该注意到天聪四年九月的《玉皇庙碑》上，曹振彦已是“致政”。经研究，“致政”就是“致仕”，也就是“退休”。曹振彦此时尚是少壮之年，不可能退休。那么这时或许他已不属佟养性的部下也未可知，这个问题还得等有更新的文献资料出来，才能解决。二是，它说明曹振彦此时已升为“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了。（按，“旗鼓”是指作战部队，以与“管领下人”——从事生产的农奴、工奴相区别。）“佐领”是掌握三百人的军职，是有实权的。正白旗属上三旗，归内务府。所以入关后其子曹玺、孙曹寅都属内务府，其原因即在此。三是，它说明曹振彦“因有功”，又升了半级。当时明金双方战争频繁，曹振彦的“功”自当是战功，在此之前天聪五年有大凌河之战，曹振彦也可能是参加这次战争而立功的，是否如此，亦当待有确切的资料才能

论定。

总之，这条天聪八年的材料，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 (二) 两篇《曹玺传》

### 1. 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佞，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金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安）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金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祲，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丁巳、戊午两督运，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剖。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甲子六月，又督运，濒行，以积劳感疾，卒于署寝。遗诫惟训诸子图报国恩，毫不及私。江宁人士，思公不忘，公请各台崇祀名宦。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以继公绪。寅，敦敏渊博，工诗古文词。仲子宣，官廕生，殖学具异才。人谓盛德昌后，自公益验云。

### 2. 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